

# 船山學刊

(双月刊)

创办于 1915 年 8 月

## •《船山学刊》创刊百年纪念专栏•

钱基博笔下的王夫之

——读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

王玉德(01)

湖南船山学与《船山学刊》百年

周发源(04)

“《船山学刊》创刊百年暨船山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学术研讨会综述 章 敏(08)

## •船山学研究•

试论王夫之自然哲学的历史地位

徐仪明(16)

船山梦与当下中国梦相契合的三个基本维度

陈力祥 李 丹(23)

王船山“实践”思想的内涵及研究意义

冯 琳(30)

## •湖湘文化研究•

毛泽东与湖南抗战精神

夏远生(39)

南天一柱：湖南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祭

李跃龙(51)

船山学刊·2015 年第 5 期(复总第 99 期)·目录·

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

• 儒佛道研究 •

- 《孟子》治国平天下与中庸思想 高 兵 ( 59 )
- 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政治思想浅议 王沁凌 ( 64 )
- 从反讽概念看王龙溪的人生境界学说 黄泰轲 ( 70 )

• 易学研究 •

- 《易传》作者问题检讨(下) 郑吉雄 傅凯瑄 ( 76 )

• 传统与现代 •

- 罗国杰先生对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探索和学术贡献 王文东 ( 88 )
-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个体之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思考 章伟文 ( 96 )
- 中国儒道对“天”的认知和中西文化差距本源探究 胡 岚 ( 104 )
- 船山诗文赏析(十三) 心 广 ( 29 )
- 船山诗文赏析(十四) 心 广 ( 63 )

## 《易传》作者问题检讨(下)

郑吉雄 傅凯瑄

### 一、当代学者的探析

经过古史辨时期的多方论证,《易经》为卜筮之书,《易传》为哲理之书,两者性质不同,已渐成定说,但孔子与《周易》经传关系的争论,并未就此尘埃落定。

以《鲁论》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”论证孔子未尝读《易》之观点,虽然风行一时,甚至使得郭沫若改变了对《周易》经传时代的推论,影响力之大,可见一斑。然而对部分学者来说,若无更多确切有力的证据,仍倾向于接受孔子读《易》、传《易》的旧说。而有学者则因肯定《易传》的思想价值,再次将孔子与《易传》连结起来。此外,出土文献也为旧说提供了新的证据。

1973 年马王堆帛书出土<sup>①</sup>,其中有以宫卦形式排序的《周易》,还有与传世《易传》内容、形式相近的作品<sup>②</sup>,对于考察《易传》的作者与时代问题,提供了新的材料,有助于学者进一步厘清种种复杂的现象<sup>③</sup>。其中《要》篇中提及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”<sup>④</sup>,可证《史记》言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”,并非向壁虚造。而孔子对于《易》理的阐发,更成为学者肯定孔子传《易》的重要依据<sup>⑤</sup>。浅野裕一据郭店楚简《六德》“观诸诗书则亦在矣,观诸礼乐则亦在矣,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”,及《语丛一》“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”、“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”、“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”等语,推论战国前期儒者已将《易》视为经

典。而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《周易》的内容与通行本基本一致,且此批文献都属思想方面,并无日书等占卜书,亦可以证此时《易》被视为与儒家有关之文献而非占卜书。以往多认为《易》在战国至汉初才成为儒家经典,随着战国楚简的发现,实可把时代再前推约两百年,亦即《易》作为儒家经典,孔子晚年好《易》、自撰《易传》等说法,最迟在战国前期,甚至可能从春秋末期便已开始。<sup>⑥</sup>这些证据均指向《周易》经传与孔子关系密切,绝非秦汉儒者所附会。而在《易传》问题上,孔子究竟是“述而不作”,还是确曾手定部分内容?如果是“述而不作”,那么《易传》写定于何时?撰者的思想归属为何?这些问题均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。

#### (一) 孔子与《周易》经传关系的再确立

1920 年以降,学者多认定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之时代不同、性质不同,不宜合观,此后研治《周易》者亦多坚守“经传分离”的立场。如上节所引梁启超、苏渊雷、张心澄之说,已启其端。另如屈万里(1907—1979)谓:“《易》之为书,只为占筮而设”,而“十翼说经,惟务义理”,故治《易》之途径,首当“以经观经,以传观传”<sup>⑦</sup>。高亨(1900—1986)之说亦相近:

《易传》解经与《易经》原意往往相去很远,所以研究这两部分,应当以经观经,以传观传。解经则从筮书的角度,考定经文的原意。……解传则从哲学书的角度,寻求传文的本旨,探索传对经的理解,……这样才能明确传的义蕴。<sup>⑧</sup>

作者简介:郑吉雄(1960—),男,香港人,香港教育学院文化史讲座教授兼协理副校长(课程发展),荷兰莱登大学国际亚洲研究院欧洲汉学讲座,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(退休),香港;  
傅凯瑄(1978—),女,台湾台北人,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,台北,11657。

朱伯崑(1923—2007)也认为唯有将经传分家,区别经传不同的历史背景,才能真正掌握经传的面貌<sup>⑨</sup>。刘大钧、林忠军则检讨前人以《易传》附经的作法“虽有利解经,但容易造成经传不分,不利于对二者自身所具有的体系、价值、特点等进行研究。故今天研究《周易》将经传分开,似乎势在必行”<sup>⑩</sup>。劳思光(1927—2012)也指出:“易传各篇本身理论虽互有不同,但皆与易卦爻辞有根本之违异;此盖因易传之出现乃在战国及秦汉一段期间,立说者本祇托易以为说,并非真欲解释卦爻辞。”唯有将经传分而观之,“方可避免传统文人之根本错误”<sup>⑪</sup>。

在部分主张“经传分离”的学者看来,《易传》虽是不称职的传,却是足以展现先秦哲理高度的代表之作。如屈万里即谓“十翼阐发哲理,大率皆儒家言,语多精粹,尤治先秦思想史者之要籍”<sup>⑫</sup>。徐复观(1904—1982)认为“《周易》原是卜筮之书”,其性质“有如今日江湖术士的测字、看相、算命”,“原来是没有多大哲学意味、思想价值的”,而“赋予《周易》以哲学的意味,当来自作为《易传》的十翼”<sup>⑬</sup>。高亨则说“《易传》虽是筮书的注解,然而超出筮书的范畴,进入哲学书的领域”,并肯定其为“先秦时代相当重要的思想史料,特别是此时代首屈一指之辩证思想史料”<sup>⑭</sup>。曾春海也主张:“‘经’原系卜筮用书,……‘传’既取理解和义理表达之路向,则《易》书渐由卜筮之书,转进成探讨宇宙与人生哲理的经典。”<sup>⑮</sup>戴君仁(1901—1978)推崇《易传》阐发哲理,是《易》由占卜书成为哲学书的关键:

虽然卦爻辞也有极有道理的话,可是赋《易》以哲学价值者,却在《十翼》,有了《十翼》之后,《易》才不是卜筮之书,而为儒家哲学的总汇。<sup>⑯</sup>

牟宗三(1909—1995)也认为《易经》是占卜之辞<sup>⑰</sup>,而谓:

《易传》成一套玄思,代表孔门义理,这是确定的。<sup>⑱</sup>

林丽真亦指出:

“经”的部分,……其中有义理可以究诂的实在很少,而且很多语句颇令人费解,所以自朱熹提出“易本卜筮之书”的见解以后,卦爻辞是西周初叶卜筮官的占筮纪录,已成定案。“传”的部分,……大体上乃是发挥儒家的政治、伦理哲学,但其宇宙论则与《老》《庄》略有相通之处。<sup>⑲</sup>

均主张《易传》之思想与儒家密切相关。至于占筮之《易经》何以能被改造为义理之《易传》,学者推言孔子可能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。如余敦康谓:

在从《易经》到《易传》的发展过程中,孔子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,占了极端重要的地位。<sup>⑳</sup>

刘大钧认为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等主要篇章,虽是后人托孔子之名所作,但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<sup>㉑</sup>。而徐复观在1961年所撰《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》中便已提到:

《易传》中引有“子曰”的,分明是编定的人认为这是孔子的话;没有“子曰”的,便是传承孔子《易》学者的话。……孔子对《易》的贡献,是从由实物相互关系的想象所形成的吉凶观念解放出来,落实在人间道德的主动性上;并把作为行为理想标准的“中”,应用到《易》的解释上去。<sup>㉒</sup>

方东美(1899—1977)则认为:“本来在汉以前,符号和卦爻辞的系统属于古代的易经,而十翼则是孔子和商瞿一学派的成就,这两部分直到汉代是分开的。”又谓:

周易的符号系统只是历史的记载,即使有哲学意义,也只有含藏其中而已。……我们现在必须明了周易的哲学和周易的历史记载是两回事,历史记载在前,哲学产生在后。周易这部历史的书变为哲学的书,代表儒家、代表孔子的精神。<sup>㉓</sup>

此皆可见诸家是因《易传》的思想属性而将之与孔子、儒学联系起来。如强烈坚持《易传》绝非孔子所作的高亨,也不反对孔子曾读《易》、赞《易》之说<sup>㉔</sup>,又如朱伯崑并不赞同将《易传》的



思想皆归之于孔子<sup>⑤</sup>，但也指出孔子确曾解《易》并影响了后来的儒者<sup>⑥</sup>。综观各家之说，虽多肯定孔子与《周易》经传并非毫无关系，然已不再从传统“易历三圣”的角度推崇《易传》能阐发《易经》之义理，而是赞扬《易传》能化腐朽为神奇，将哲学思想寄寓在《易经》这种筮书中。学者既否定《周易》经传之关系，对于《易经》或不进行研究，或只从史料的角度探寻经文所呈现的社会生活，而将《易传》看作孔子开创、后学发挥的儒家思想，反映的是时代思潮，故着重于思想的横向联系，不再上溯。

## （二）《周易》经传关系的再思考

当“经传分离”的主张蔚为主流之际，仍有学者坚持“传承经义”，此即“传”的义理是与“经”相联系的。虽因古史辨影响，学者多不信《易经》为文王所作，但仍强调《周易》是以占筮形式寄寓义理之书，孔子好《易》故而有其阐释。金景芳（1902—2001）、黄寿祺（1912—1990）、黄庆萱、李学勤、黄沛荣、金春峰、郑吉雄等学者即持此一立场。

《易经》真是一部漫无体统、毫无义理的“卜筮之书”吗？部分学者深入研究卦爻辞之后，提出不同的看法。李镜池在 1930 年撰《周易筮辞考》，力主“《易》为卜筮之书”<sup>⑦</sup>，但在 1961 年发表《关于周易的性质和它的哲学思想》，改谓《易经》“虽然是一部占筮书，而其中就有哲学思想”<sup>⑧</sup>。1962 年发表《周易的编纂和编者的思想》则指出“《周易》虽然是根据旧有资料汇集起来以供占者参考”，但“这里面有编者或编辑团体经过分析而作出来的系统思想，而不是数据汇编”，“每卦有它的重点，讲一个问题”，他还特别强调研究卦爻辞要经过系统的分析，不可个别摘引<sup>⑨</sup>。屈万里晚年亦谓：“卦爻辞本为占筮而设；但，显然地，它有不少地方，是寓哲理于占筮。”<sup>⑩</sup>朱伯崑则指出：卦爻辞曾经编纂者加以“系统化”，所体现的思想与西周的意识形态一致，卦象卦序中隐藏着逻辑思维<sup>⑪</sup>。黄庆萱也认为：“《周易》之作，源于忧患意识，含有天人合一的观念，因而见重于儒家。”<sup>⑫</sup>黄沛荣在《周易卦

爻辞释例》中提到：研究《周易》卦爻辞释例的目的之一，即在于“阐明卦爻辞之哲学”，直指卦爻辞本身具有哲学成分<sup>⑬</sup>。戴璉璋也认为“明象位、重德业是易学发展的两大主脉。这两条主脉，发端于《易经》，贯穿于《春秋》，而结穴于《易传》”，并肯定《易传》对《易经》“作了最好的继承与发展”<sup>⑭</sup>。金春峰则指出《周易》具有“两重性”：既是“占卜之书”，也是“哲学与义理的文本”，后者“集中表现在它明确自觉的辩证法观念”<sup>⑮</sup>。

另有学者注意到《易经》中所蕴藏的政治思想，如高怀民在《先秦易学史》中指出：“位”、“时”、“中”等观念，实是先圣相传的重要政治思想，文王取之融入伏羲的八卦哲学，“《易》学的根本哲学理论也变成了治国理民的政治学术的依据”，故《易》不只是占筮的书，更是哲学理论的书、政治思想的书<sup>⑯</sup>。金景芳向主《周易》有一套辩证哲学，他在《易论》中则推论：《坤乾》首坤次乾、《周易》首乾次坤之异，正代表了由殷道亲亲重母统，转向周道尊尊重父统<sup>⑰</sup>。其晚年所撰《论〈周易〉的实质及产生的时代与原因》，主张《归藏》是殷商政权的指导思想，文王将其改造为《周易》，乃欲以此推翻殷商政权，重新肯定文王作《易》的旧说<sup>⑱</sup>。而郑吉雄近十余年来曾撰作多文，对卦爻辞进行深入探析，论证《周易》并非单纯的卜筮纪录，而是周人在殷周易代之际所撰作的政典，标识了朝代的政治方针，尚阳主变，修德教化，与殷易《归藏》的保守浪漫大相径庭。《周易》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士大夫之学，用以教育士大夫治身治国所应具备的生命知识，前人将作卦爻辞之人系于周文王，正反映了殷周鼎革时的忧患意识<sup>⑲</sup>，可见《易经》实是富有哲理的先王政典，孔子正是认识到此点，故读《易》好《易》。而孔子既深于《易》，故儒学中本就有得力于《易》理之处。郑吉雄审视《论语》全书，指出孔子常用《易经》之语，并常隐括卦名及卦爻辞以立言，推断孔子“汲取了《易》道刚健的精神，成为其思想的重要基础”<sup>⑳</sup>，为孔子曾读《易》之说，提供了更坚实的证据。

正因为《易经》本身即有哲理,故《易传》实为阐明卦爻辞的哲理而作,并非主张“经传分离”者所谓“利用卜筮的外壳以寄寓儒家学说”。金景芳即指出:

孔子讲《易传》,讲的就是《易经》,是给《易经》作传,不是讲他自己的思想,是讲《易经》的思想。……《易传》全部是对《易经》的解释。<sup>④1</sup>  
黄沛荣亦谓:

《易传》为说《易》之作,对于卦爻辞之义蕴,自应予以阐发;换言之,影响《易传》最大者当为卦爻辞矣。<sup>④2</sup>

主张“经传分离”者往往据著作时代及性质分论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,截断两者的内在联系,故两位学者皆提示应当重新看待《周易》经传关系。郑吉雄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,运用诠释学理论,对照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演绎字义的方式,指出《易经》各卦卦爻辞常扣紧一个观念字(往往为卦名),由不同向度加以演绎,从而在一卦之内创造出多重新意义。《易传》则完全承袭了此种方式,扣紧“经”的字义,加以演绎,创造出新的义理。以此为据,最能证明“传承经义”的现象。进一步说,任何人要研究儒家的《五经》,都无法舍弃众多的解经之“传”<sup>④3</sup>。郑吉雄从诠释方法着眼,深入考察经传关系,提供了审视“传承经义”的新视角。

“经传分离”与“传承经义”两种切入角度,虽同样肯定孔子与《周易》经传的关系,然所持理由实大不相同:前者从《易传》的价值追溯,以儒学为主;后者则从《易经》的哲理延伸,以《易》学为主。而后者认定《易经》本身即有哲理,显然更能合理地解释《史记》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”的记载。孔子既将《易》理内化为儒学的一部分,儒者依其说而撰《易传》,《易传》与儒学自然有相合之处。如黄庆萱指出《周易》见重于儒家,而“《周易》所言仁智之道,诚敬之教,时中之用,寡过之效,也便代表《周易》大义之所在,儒家思想的重心了”<sup>④4</sup>。又如郑吉雄据卦爻辞二十条论“君子”的内容,论证《易经》本为教育士大夫的典籍。若此论成立,则可进一步推

言孔子的教育思想曾受《易经》之启发。黄寿祺《从〈易传〉看孔子的教育思想》一文则以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中的“子曰”三十一条为据,考察二传中的教育思想,发现二传“与《论语》相对照,是在在吻合的”<sup>④5</sup>。然《易》学与儒学,有同有异,不宜混为一谈:先秦的儒家、道家皆吸收《易》理而加以转化,故《易》学并不等同于儒学。而儒学的来源除《易》,尚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等周代政典,亦不能简单将儒学与《易》学画上等号。唯有了解《易传》之核心在于以儒学诠释《易经》卦爻辞的哲理,并掌握《易》学与儒学的发展脉络,才能更确切地说明《易传》在先秦学术思想上的价值。

### (三)《易传》的作者与时代辨析

孔子曾读《易》而有所阐述,甚至有所撰作,虽已重新为学者所接受,然今日所见《十翼》是否即为孔子所作,多数学者的看法仍有保留,主张《十翼》应为孔子门人及后学持续编纂而成,无法完全断言何者为孔子所写,何者为门人所记,宜视为儒者之集体成果。方东美便谓《十翼》“是孔子到商瞿以后才有的,是春秋时代的产物”,但“春秋战国时代没有个人著作,只有集体著作,没有写作传统,只有口说传统”,难以断言《十翼》成于孔子一人之手<sup>④6</sup>。牟宗三谓“《十翼》不必是孔子所作,但《十翼》之出于孔门,当无可疑”<sup>④7</sup>。戴琬璋则指出:《易传》与《论语》除思想上有差距,语法也有不同,且从句式、押韵现象观察,亦可证明《易传》并不出于孔子,但“从各篇内容上观察,说是出于儒者之手并无可疑,而孔子诠释经义、引用经文的态度,对于《易传》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,也不容抹煞”<sup>④8</sup>。唯若不以严格定义来认定著作权,则《易传》作者当可归于孔子。戴君仁即谓:“《十翼》是孔门传《易》的学者众手所成,而非孔子一人所作”,但算成孔子所作,亦无不可。因为从学术流派上看,可以把创派的祖师看作学派的总代表,故可将这十篇归在孔子身上<sup>④9</sup>。李学勤《周易溯源》引用帛书《要》篇,指出其中虽无孔子作《易传》之明文,不过“后世之士疑丘者,或以《易》乎?”

一句,实已暗示孔子有所撰作:

孔子这段话和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所记孔子说的“知我者,其惟《春秋》乎?罪我者,其惟《春秋》乎?”意味十分相似。孔子不仅是《易》的读者,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,这正是因为他作了《易传》。<sup>⑤</sup>

对于欧阳修等学者主张《易传》中有“子曰”便非孔子自作,李学勤认为这是不了解古书形成的体例而致<sup>⑥</sup>。简言之,《易传》虽成于后儒之手,然若就其核心思想而言,仍可归于孔子名下。

诸家既皆同意《易传》成书过程复杂,难以断言是否确有孔子亲作之篇章,但仍尝试加以分辨。有部分学者肯定《易传》中的“子曰”当为孔子之言。除前引徐复观之说外,如高明(1909—1992)谓“孔子论易的话,见于《周易》书中的,有两部分,一部分见于《文言》,一部分见于《系辞传》”<sup>⑦</sup>。黄寿祺也主张:“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中所引‘子曰’的言论,更无疑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所纪录的孔子言论,可以与《论语》之文同等看待,是可以肯定和孔子有关系的。”<sup>⑧</sup>黄庆萱强调孔子于《周易》述而不作,“但是《十翼》之中的《文言传》和《系辞传》有许多‘子曰’,却多是孔子弟子或更后的弟子们所记孔子的话”。黄沛荣则由修辞之习惯,证明孔子与《文言传》、《系辞传》之关系,指出二传“与《论语》诸条同为孔子之言。故《易》传七种虽非孔子手定,然其论《易》之语亦当为弟子所记而载诸《易》传之中”<sup>⑨</sup>。此外,前人虽谓《易传》非尽为孔子所作,多仍肯定《彖》、《象》为孔子所定,黄庆萱亦认为“《彖》、《象》两传,也有许多与《论语》主旨相合之处。可能也是孔子对易卦爻辞的阐释,弟子纪录而成”<sup>⑩</sup>。胡自逢(1917—2004)除肯定《系辞》中的“子曰”为孔子之言<sup>⑪</sup>,又指出《彖传》当为孔子所作:“唐以前儒者多以《彖传》为孔子所作,今由《彖传》文字之朴直简洁及其内容多与儒家之言相符,可云是孔子所作,时代则在春秋。”<sup>⑫</sup>高怀民在《彖》、《象》之外,又指出:“《系辞传》上下及《文言传》三翼为

孔子之弟子或再传弟子所成”,因此这四传“应系于孔子名下,不应说是孔子以后人之作品”<sup>⑬</sup>。

近人中主张《十翼》皆为孔子所作者,可以金景芳为代表。他在《关于〈周易〉的作者问题》中,指出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中有关策法、卦的性质等部分,应是孔子学《易》以前就有的,不是孔子所作。而如《系辞》、《序卦》两者“在思想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”,如此高明的思想,唯有孔子方能说出。又谓:

根据我多年学《易》所得,认为《易传》十篇基本上是孔子所作。但里边有记述前人遗闻的部分,有弟子记录的部分,也有后人窜入的部分,脱文错简还不计算在内。<sup>⑭</sup>

金景芳的学生吕绍纲(1933—2008)承其观点,进一步从三方面论证《易传》确为孔子所作:一、在思想上,“《易传》的思想同《论语》、《春秋》相比较,二者完全一致,找不到乖违之处,甚至可谓无隙可乘”。二、在历史文献学上,肯定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记载。三、在考古文献学方面,引帛书《要》篇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”,肯定孔子读《易》亦作《易传》<sup>⑮</sup>。此种强烈肯定“孔子作《易传》”的立场,当是一种对疑古思潮的反思,有助于刺激学者重新检视《易传》的作者与时代问题。

而若要以严格的作者观念推定《易传》的写作时代,则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黄沛荣《孔子与周易经传之关系》指出当代学界看法主要有三:一、著成于战国之世;二、著成于战国末期至汉初者;三、著成于秦火之后<sup>⑯</sup>。杨庆中所撰《周易经传研究》中“《易传》成书的年代”一章,详细整理了学者们对于七篇《易传》个别著成时代的不同意见<sup>⑰</sup>。大体而言,目前学者多认定出于战国时代<sup>⑱</sup>,然若要更细分出初、中、晚期,各家意见又有不同。如戴君仁、高亨、戴璿璋皆针对《彖传》及《象传》的押韵现象进行研究,戴璿璋在戴、高二人的基础上,指出二传押韵现象近于《荀子》、《老子》及《楚辞》中之屈宋赋,故定为战国后期的南方儒者所作<sup>⑲</sup>。不过此种方法只能判断文献的著成时代,无法确定思想产生的



时代。张岱年(1909—2004)则利用“基本概念范畴的提出与演变”及“基本哲学命题的肯定与否定”进行研究,判断《系辞》当成于老子之后,庄子之前,《文言》时代与《系辞》相近,《彖传》在荀子之前,而《象传》晚于《彖传》,故谓《易传》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的著作<sup>⑤</sup>。其后刘大钧在张岱年的基础上,进一步辨析《十翼》成书的先后顺序,推论《彖》、《大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都略早于《系辞》,因而将《易传》基本部分的时代提前到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<sup>⑥</sup>。金德建(1909—1996)则论证《中庸》与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之内容有十二处相通,进而推断子思吸取融贯二传而撰成《中庸》,故二传的产生不会晚于子思的时代<sup>⑦</sup>。又如戴璉璋主张“《大象》作者在本体与工夫方面的词语接近《大学》,而思想的脉络则可谓直承孔孟”,他以“震”卦《大象》为例,指出“君子以恐惧修省”之“恐惧”,当是孟子所谓“孔子惧,作《春秋》。……吾为此惧,闲先圣之道”之“惧”,并非一般畏惧害怕之意,而是在忧患危机中“产生的一种怵惕惻隐、悚然戒慎”,<sup>⑧</sup>但金春峰的看法恰恰相反,他认为“恐惧”、“修省”等观念,“正好是《大象》早出,成于《左》、《国》时期或春秋晚期孔子时代的证据”<sup>⑨</sup>,而“《彖传》和《小象》中的伦理政治思想,应用了很多孔孟儒学的观念,表现出战国的时代特色”<sup>⑩</sup>。

近四十年,大量的出土文献为先秦思想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比较基点。如李学勤即由出土的《五行》推论《中庸》应是子思所作,进而指出从属《子思子》的《中庸》、《坊记》、《表记》、《缁衣》四篇,其体裁文气甚似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,引《易》也多,推断在子思时代已有《易传》的基本内容和结构。他又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唐勒赋》推断体裁相同的《小言赋》确实出于战国晚期,而《小言赋》中有几句话本于《易传》,故可推定《易传》的著成时代当不晚于战国中期<sup>⑪</sup>。郑吉雄据其考察所得,指出《易经》的思想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论,对照郭店楚简《太一生水》的“水”宇宙论,再考察“乾”卦《彖传》以“云

行雨施”和“大明终始”说“乾元”,是一种结合了“太阳”和“水”为中心的新宇宙论,可推断《彖传》应写成于《太一生水》之后<sup>⑫</sup>。综上所述,此种思想辨析方式,虽能较精确地推言各传之著成时代,但运用时有亦有限制:一、概念提出的先后未必即等于概念发生的先后<sup>⑬</sup>;二、部分作为比较基准的文献究竟成于何时,仍有争议<sup>⑭</sup>,故仍有待学者对先秦各种文献资料作出更细密、周延而深入的辨析,方能获致更精确可靠的成果。

#### (四)《易传》的思想归属

至于《易传》作者若为儒者,其当属思孟一派,荀子一派,还是自成一派,学者们亦有不同看法。主张当属思孟一派者,如方东美认为“《周易》是从孔子传到子思的家学,孟子则从子思领受了《周易》的精神”,故主张《孟子》虽不言《易》,实对《易》有真正透彻的了解<sup>⑮</sup>。戴璉璋谓“战国后期的儒者,如《中庸》、《易传》作者以及《乐记》的作者们,继承了孔、孟修人道以证天道的教义后”,进一步“明天道以弘人道”。而《易传》中“自昭明德”、“反身修德”、及“敬以直内,义以方外”等思想,“与孔子‘为仁由己’、孟子的‘反身而诚’以及仁义内在的性善说,都是同一血脉”<sup>⑯</sup>。刘大钧以“中”的概念为例,指出“中”是《周易》古经中重要的概念,经过孔子的肯定与发扬,子思、孟子、《中庸》亦皆称誉中道,故《易传》的“尚中”思想应属思孟学派,他又比较思孟与《易传》中“诚”、“遁世思想”、“播五行于四时”等概念,推言“《文言》、《彖》、《象》应属思孟学派所整理、润色,《系辞》中亦有思孟学派的内容”<sup>⑰</sup>。这种观点以《易传》代表孔子思想,以思孟为儒学正统,仅着眼于儒学内在的流变,忽略经传的联系,不免有所不足。然若就《易传》与思孟相通之处来看,或可谓儒者已将《易》理内化为思想核心,依儒学自身的脉络开展。

主张与荀学关系较密切者,如郭沫若比较《荀子》与《系辞》中“道”的观念,认为后者完全是前者的复写,而《彖传》、《文言传》言“乘龙以



御天”，属于“南方系统的着想”<sup>⑧</sup>，其说虽多主观之处，但主张《易传》作者当为南方儒者，颇有启发性。李学勤强调思孟学说与《易传》虽有相通之处，但主要是继承孔子的《易》论而来，不必然代表思孟一派曾治《易》<sup>⑨</sup>。而《荀子》书中曾引用《周易》经传，且《乐论》采自《乐记》，《乐记》中“天尊地卑”一节袭自《系辞》，或许也代表荀子与《易》学有某种关系。荀子的《易》学上承孔子以降之传统，重在义理而非占筮，后传至陆贾、穆生，在晚周到汉初颇有影响<sup>⑩</sup>。这是从《易》学流传的角度推言《易传》与荀子一系更为密切。黄沛荣从思想上举出三项论据，说明《易传》与荀子学说颇有关联：一、《荀子·大略》“易之咸”一段与“咸”卦《彖传》略同，可能有相同的来源，其间并不必然有因袭的关系，但亦可见两者的思想显然有关。二、《易传》以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人”配合的“三才”之说，亦见于《荀子》。三、《易传》好言“积”，此于孔、孟思想中少见，而于《荀子》中屡见<sup>⑪</sup>。所论皆是《易传》与《荀子》重要的思想特点，值得注意。而前引戴君仁、高亨、戴瑛璋均由押韵现象论证《易传》应出于荀子之前的南方学者，则是就成书的地域而言。要之，荀子确曾学《易》传《易》，但《荀子》与《易传》之思想相通处，可能是《易传》影响了《荀子》，也可能是两者同受某一派《易》说所启发，彼此间的传承关系须再探究。

另有学者认为《易传》与思孟、荀子二家各有同异，且其中又多杂有其他学派的思想，应属一特殊流派。如朱伯崑谓：

儒家的伦理观念，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天道观，成了《易传》解《易》的指导思想。《易传》实际上是哲学著作，有自己的理论体系，成为战国时期一大哲学流派。

强调《易传》反映的是“战国时代哲学发展的面貌”，与时代的联系更甚于与孔、孟的联系<sup>⑫</sup>。徐复观则由《史记·儒林传》、《汉书·儒林传》之记载，指出“《易》的传承地乃在齐鲁”，但他认为“与曾子子思孟子这一派似乎并无关系。与荀子的关系亦甚少”<sup>⑬</sup>。由孔子发展到子思、孟

子，本是“由内通向外的道德精神”，但《易传》言道德“外在的意义较重”，又在“性与命之中，介入了阴阳观念”，“反而多一曲折”<sup>⑭</sup>。而《易传》中的阴阳思想，至荀子时“当已发展完成”，荀子可能曾受《易传》思想影响，然“《易传》主张天人合一，而荀子则主张‘惟圣人不知知天’”，两者迥然不同，是以谓“《易传》系统，在儒家中恐系独成一派的”<sup>⑮</sup>。余敦康亦将《易传》与孟、荀两家的思想各作比较，指出《易传》中“明德慎罚”与孟、荀的王道思想一致，而对礼的解释及神道设教的思想则更接近荀子，故谓：

《易传》和荀子有很多共通的地方，和孟子相比，有很大的不同。比如在天道观的思想方面，《易传》和荀子显然都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，但是在孟子那里，却找不到这种迹象。比如在政治思想方面，孟子是反对当时刚刚兴起于三晋地区的法治思想的，但是《易传》和荀子却站在儒家的立场，把法治思想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。

然荀子主性恶，《易传》主性善，两者在人性论上是对立的，因此他不赞同将《易传》归于荀子一派，而谓：“《易传》思想自有特色，应该独立成派。”<sup>⑯</sup>徐、余二氏均从思想的关键处，深入分析《易传》与孟、荀之异同，立论笃实可参，然不免因受“《易》为卜筮之书”及“经传分离”的成见影响，忽略了《易传》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，但它扣紧着卦爻辞来诠释，并非畅论儒学之作。若仅将《易传》视为独立个体，在考察著成时代、思想归属等课题时，便有盲点。郑吉雄探讨先秦隐逸思想时曾试图回归古史，以经释经，用《尚书·多士》、《诗·大雅》等经典与《易经》“坤”卦互证，指出“坤”卦卦爻辞或为告诫殷遗民之语。其后《文言》在诠释“坤”卦时，遂多着眼于君臣关系，不自觉复述了《易经》作者呼吁殷遗民顺从王事、卑作臣民之意<sup>⑰</sup>。如然，则《文言》的撰作时代虽距周革殷命的年代已远，但所阐述的思想却可能渊源甚早，不尽然受时代思潮或学派所影响，即是一例。《易传》作者主要的关怀在于诠释《易经》，自然与孟、荀以儒学为核

心进行发展有所不同,可说是儒家中特殊的一派。而作者为诠释《易经》,吸收了各家各派对于《易》的解说,或是可与《易》理相发明之处,虽有时代之影响,然始终聚焦于《易经》。研究者除探索思想的横向联系,亦应关注《易传》与《易经》的纵向联系,不宜将《易传》义理全部归于孔子或儒者之创发。

另一值得重视的看法是陈鼓应的“道家主干说”。陈鼓应撰有《易传与道家思想》、《道家易学建构》二书,力主《易传》当属道家之作,绝非儒者之言。前书主要阐述《易传》与老、庄和黄老思想的一致性,《序》中指出:

先秦的辩证法体系只有一个,即从老子(原注:包括庄子)至《易传》(原注:《易经》只有萌芽性观念),它们的思维模式基本上是同一的。<sup>⑧</sup>但易道主刚<sup>⑨</sup>,老子尚柔,似乎南辕北辙,如何能说《易传》为道家产物?陈鼓应解释道:主柔、主刚乃是道家体系两个侧重面,老子虽尚柔,但《管子·枢言》等稷下道家的作品则崇尚尚刚。何况先秦儒家典籍从未有刚柔对举之例,更未有于刚柔对立中尚刚之主张,因此《易传》尚刚正可证明其与稷下道家有关而非儒家之作<sup>⑩</sup>。而在后书中,他强调《易经》的占筮语言发展至《易传》的过程中,已融入了道家思想,向道家哲学延伸:

《易》本是殷周之际的占筮之书,自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时间里,逐渐由哲理化而哲学化,其哲理化是春秋以降解《易》者的成果,而其哲学化则是受了老庄及稷下道家思想的洗礼。<sup>⑪</sup>此种“道家主干说”,亦是“经传分离说”的产物:只侧重于分析《易传》,而忽略《易传》与《易经》联系。关于此说之非,已有多位学者撰文辩驳<sup>⑫</sup>。黄沛荣即指出:《老子》思想与《易》有关,某些思想是《老子》、《易传》同受卦爻辞影响,而非《易传》受《老子》影响<sup>⑬</sup>。郑吉雄则大胆推论《易经》为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共同来源,《易》理本于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论,尚乾主刚,而老子及战国道家则远溯遗民思想,采《归藏》立坤为首的学说,尚水尚阴尚地<sup>⑭</sup>。这两种明显不同

的宇宙论,正是《易传》与道家根本性的歧异。萧汉明(1940—2011)留意到文献著成先后问题:“《象》、《系》与《管子》稷下道家之作以及《黄帝四经》的成书先后尚无定论,谁影响谁的最最终结论尚有待时日。”<sup>⑮</sup>陈鼓应主张《系辞》是稷下道家所作,但若《系辞》的成书时代先于稷下道家,则稷下道家的尚刚思想可能反受《系辞》影响而产生。诸家之批评皆直指核心,使“道家主干说”面临严峻的挑战。

而当学界多倾向回归孔子确曾读《易》赞《易》的传统说法时,亦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。何泽恒在《孔子与易传问题复议》一文中,指出四项问题实际上仍未得到解决:一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论孔子与《周易》经传一段,标点应从金德建之说,作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,序《象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”,故司马迁述孔子所作《易传》范围,仅《象》、《系》、《文言》。《说卦》以下三篇晚出,前人已论及;而《系辞》之定名与编缀可能在司马迁身后。二、“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”,“易”字如不依《鲁论》作“亦”,此句难释;三、《史》、《汉》所载孔门传《易》谱系,先秦以上恐不可信。四、帛《易》佚传的词汇用语,时代较晚,思想上与今本矛盾或彼此矛盾,甚至与儒家学说不合。此外,孔子读《易》、喜《易》、赞《易》、传《易》是不同层次上的问题,并非证明孔子曾读《易》,就能推论其他三项<sup>⑯</sup>。这些论点提醒研究者:在《易传》作者的问题上,仍有许多文献问题必须谨慎处理,不宜轻下断语。

本节综述近代学者对《易传》作者研究之各种面向及主张。“《易传》成于战国儒者之手”是当前多数学者的共识。而若再更深入探析,各家虽皆有精辟的论证,却又各存在一些限制。由本节所述,可知在考辨《易传》作者相关问题时,学者们所使用的材料、所运用的方法相近,结论却往往大异其趣,关键有二:一、由于先秦文献多为门人弟子不断增益而成,要判定具体的写作时代仍有困难。即使可以判定文献的写定时代,亦不必然可以推断其中某一思想发生的时代。基点既无法确定,比较后也难下定论。



二、以往研究者多忽略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的紧密联系,只将《易传》思想源头上溯到孔子。如不能掌握《易经》的义理,则可能错估《易传》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定位。是以今日若要研究《易传》的作者、时代、思想归属等相关问题,除须掌握先秦各家各派的思想要旨及流变外,最重要的应当还是循“内证”的路子,研求《易经》经文,厘清“经”、“传”之间同中有异、异中有同的关系,才能得出更为翔实可信的结论。

## 二、结论

《易传》作者问题争议迄今已千余年,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《易传》作者究竟是不是孔子。大体来看,传统学者即使提出质疑,仍多认定《彖》、《象》当是孔子所作。近代学者则多断言《十翼》皆非孔子自著,于是进一步转为关注《易传》何时成书,出于何派学者之手,又该如何理解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所载孔子与《易传》之关系。

就考辨的方式而言,前人辨析《易传》作者时,主要以《十翼》各传相参,再辅以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与《易传》相关之内容,以及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相关之记载,而在辨析文义时,常常杂入“非圣人所言”的主观意见。近代学者除了利用前人的成果外,更进一步将《易传》与先秦、汉代之各类文献对勘,从文辞使用、押韵方式、思想变化、传经系统、文献流布等各种现象进行分析,近年来又辅以出土文献,材料更为丰富,方法也更为严密。

就考辨的目的来看,传统学者将经典视为政治制度的根本、个人行事的准则,具有神圣性与唯一性,不容质疑。当经典所记述的三代之治始终无法达致,有些学者开始怀疑旧解有误而尝试提出新论,有些则质疑其中杂有非圣人之言而试图加以清除,《易传》作者问题属于后者。由于《易传》虽称为“传”而实有“经”的地位,故欧阳修亟言不辨《易传》作者恐有“害经惑世”之弊。近代学者考辨《易传》作者之目的,则

在于摘除儒者所赋予经典的神秘面纱,建构思想史之脉络,大略而言:古史辨时期学者受到反传统思潮的洗礼,多带有摧破旧说的企图,往往利用看似客观的方法,证成充满主观的结论,标新立异,以期引起关注。晚近学者则重拾对传统文化的敬意,更纯粹地以学术的角度来看待此一问题,尝试厘清先秦思想之纵向发展,以及各家学说之横向互动。不过,由于先秦文献流传的过程中,初为口说传授,著于竹帛之后,往往又经后学不断增益,是以若要用思想对比参照的方式来确认《易传》的著成时代,具有一定难度。此外,在经传分离的观念笼罩下,学者多将《易传》视为《易》理之源,而《易传》思想以儒家为主干,故推本于孔子的创发,不再上溯,又或只着重于战国时代各家思想的交互影响。实则《易经》富涵义理,孔子吸收《易》理而融会自己的学说,有继承的一面,亦有开创的一面。如不了解《易经》,则难以清楚说明《易传》的承继与开创。

自欧阳修始疑《易传》作者非孔子,经过崔述、康有为等人推波助澜,质疑声浪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疑古运动中达到最顶峰,近年来学者们又重新肯定《易传》与孔子之关系,乍看之下,像是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,然而所谓“原点”,风光已与千年前大不相同。在此一过程中,触及了《周易》经传性质,孔子思想,先秦至汉代儒学,及先秦百家思想之互动等种种课题,对于先秦学术史的研究,意义十分重大。目前对《易传》作者的考辨尚无人人信服的答案,未来除了将期待寄诸新的出土材料,更有俟于学者以新眼光、新观点对《易经》、《易传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马王堆帛书出土于三号墓,墓葬时代推定于文帝前元十二年(168B. C.)。参李学勤为《马王堆汉墓文物》所撰之《序》,傅举有、陈松长编著:《马王堆汉墓文物》,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,无页码。

②从1974年以来,关于帛书《周易》经传的内容不



断披露。特别是《文物》1984年第3期发表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所作的《马王堆帛书〈六十四卦〉释文》,1993年8月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3辑发表了陈松长、廖名春所作的《帛书〈系辞〉释文》、《帛书〈二三子问〉、〈易之义〉、〈要〉释文》以后,对于帛书《周易》经、传的研究分别掀起了热潮。

③廖名春即指出:帛书《周易》经、传涉及《周易》经传的作者问题,《系辞传》和《象传》、《文言传》的形成问题,传《易》的学派等问题,对于《周易》经传及易学史有重要的意义。参廖名春:《帛书〈周易〉经、传述论》,收入《帛书〈周易〉论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,第3页。

④⑤《要》篇:“子曰:《易》,我后示祝卜矣!我观示德义耳也。幽赞而达乎数,明数而达乎德,又仁〔守〕者而义行之耳。赞而不达于数,则开为之巫;数而不达于德,则开为之史。史巫之筮,乡之而未也,好之而非也。”即强调从义理而非卜筮之角度诠释《易》理。引文参廖名春:《帛书〈要〉释文》,收入《帛书〈周易〉论集》,第388—389页。

⑥浅野裕一著,陈威璠译:《儒家对〈易〉的经典化》,《周易研究》2009年第2期,收入郑吉雄、林永胜主编:《易诠释中的儒道互动》,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,第84—92页。

⑦屈万里:《说易》,原载《图书月刊》1卷3期(1941年3月),收入《屈万里先生文存》第1册,第39—45页。

⑧⑭高亨:《周易大传今注·自序》,齐鲁书社1987年版,第2页。

⑨⑫⑬朱伯崑:《易学哲学史》,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,第1册,第8—21、54—55页。

⑩刘大钧、林忠军注译:《周易经传白话解》,大孚书局1997年版,第156页。

⑪劳思光:《新编中国哲学史(二)》,三民书局1999年版,第72、80页。按:劳思光并不认为《易经》只是卜筮之书,他指出《易经》中“包括一种古代中国之重要思想”,此即“宇宙秩序”。而爻辞中所蕴涵之“物极必反”、“中”的观念,则反映了古代中国思想中的“变化”观念。参劳思光:《新编中国哲学史(一)》,三民书局1997年版,第83—86页。

⑫屈万里:《先秦汉魏易例述评·自序》,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,第4页。

⑬⑭徐复观:《中国人性论史(先秦篇)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,第203、217—220页。

⑮曾春海:《易经的哲学原理·自序》,天津出版社

2003年版,第1页。

⑯戴君仁:《卜筮之易与义理之易》,收入《梅园论学续集》,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,第211页。

⑰⑱⑲牟宗三主讲、卢雪崑录音整理:《周易哲学演讲录》,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,第3、13、16页。

⑳林丽真:《易传附经的起源问题》,收入《义理易学钩玄》,大安出版社2004年版,第38页。

㉑㉒任继愈主编:《中国哲学发展史(先秦)》,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,第657、662—666页。按:据编者《重印后记》,《〈易经〉和〈易传〉》为余敦康所撰写(第784页)。

㉓㉔㉕刘大钧:《周易概论》,巴蜀书社2004年版,第15、20—22、92页。

㉖㉗徐复观:《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》,收入《中国人性论史(先秦篇)》,第558—559、563页。他又指出:《论语·述而》“子曰: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”,如依《鲁论》“易”作“亦”,其意难释。且《论语》中曾引《易》“恒”卦九三爻辞,则郑玄从《古论》而不从《鲁论》“是不应当有问题的”。(《中国人性论史(先秦篇)》,第203—204页)

㉘㉙㉚方东美:《原始儒家道家哲学》,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版,第128、133、155、159页。

㉛高亨谓:“《十翼》虽非孔丘所作,然孔丘确曾读过《易经》,见《论语·述而》篇、《子路》篇,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曰:‘孔子……读《易》,书编三绝。’应当有所据,并以《易经》教授弟子,见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、《汉书·儒林传》。”(《周易大传今注》,第6页)

㉜朱伯崑谓:“儒家解易,始于孔子,注重卦爻辞的教育意义,不大迷信筮法,此即后来荀子所说:‘善为易者不占’。后来的《易传》,特别是《象》,正是继承孔子的这种学风,对《周易》进行解说的。《礼记》中有六处引《周易》中的话,讲说道德修养的重要性,可以代表后来儒家对孔子易说的阐发。”(《易学哲学史》第1册,第32页)

㉝李镜池在此篇篇首即谓:“我们相信《周易》是卜筮之书,其起源是在于卜筮,其施用亦在于卜筮。”收入《古史辨》第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187页。

㉞㉟收入李镜池:《周易探源》,中华书局2007年版,第155—156、201、226页。

㊱屈万里:《推衍与附会——先秦两汉说易的风尚举例》,收入《屈万里先生文存》第1册,第103页。

㊲㊳黄庆莹:《周易的名义内容大义和要籍》,收入

《周易纵横谈(修订二版)》,东大图书公司 2008 年版,第 24 页。

③③黄沛荣:《周易卦爻辞释例》,收入《台静农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》,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1 年版,又收入《易学乾坤》,大安出版社 1998 年版,第 155 页。

③④⑧⑧⑦戴建璋:《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》,文津出版社 1989 年版,第 4、10、51—54、122 页。

③⑤⑨⑦①金春峰:《〈周易〉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》,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4 年版,第 20、36—37、58、62 页。

③⑥⑧高怀民:《先秦易学史》,著者自印 1990 年版,第 93—94、356 页。

③⑦金景芳:《易论》,《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》1955 年第 2 期、1956 年第 1 期,又收入《学易四种》,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,第 166 页。

③⑧金景芳:《金景芳晚年自选集》,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,第 19—22 页。按:据篇首“我学《易》70 多年,今天已经 96 岁”之语,则此文应撰于 1998 年。

③⑨郑吉雄:《〈易经〉身体、语言、义理的开展——兼论〈易〉为士大夫之学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 12 辑,凤凰出版社 2009 年版,又收入《周易玄义诠释》,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12 年版,第 99—137 页。

④①⑨郑吉雄:《易儒道同源分流论》,《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》第 9 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,第 75—100 页。

④①金景芳:《周易讲座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,第 26 页。

④②③黄沛荣:《老子书与周易经传之关系》,收入《易学乾坤》,第 229 页。

④③郑吉雄:《从卦爻辞字义的演绎论〈易传〉与〈易经〉的诠释》,收入《周易玄义诠释》,第 67—96 页。

④⑤③黄寿祺:《从〈易传〉看孔子的教育思想》,收入黄寿祺、张善文编:《周易研究论文集(第四辑)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,第 276、291—292 页。

④⑨戴君仁:《谈易》,开明书局 1961 年版,第 3—4 页。

⑤①⑦⑨⑧李学勤:《周易溯源》,巴蜀书社 2006 年版,第 102—105、126—145、379 页。

⑤①李学勤认为古代书籍流传常经由口传,“子曰”可能是弟子代代口传过程中所加入,有区别孔子之言与《周易》经文的作用。而“子曰”也不一定是后世流传中才添入,如《孟子》一书为孟子与弟子所撰作,书中均称“孟子”,而孔子作十翼也可能是这种情况,从而指出:

“欧阳修的怀疑,缺点是不了解古书形成的体例。在纸和印刷术普及之后,人们总是用后世的眼光去观察古代,对于当时学术传流的困难缺少体会,于是产生种种误解。”(《周易溯源》,第 359—361 页)

⑤②高明:《孔子的易教》,收入《孔学管窥》,广文书局 1972 年版,第 82 页。

⑤④①①①黄沛荣:《孔子与周易经传之关系》,第 183、185、191—193、208—209 页。

⑤⑤黄庆莹:《孔子与周易》,收入《周易纵横谈(增订二版)》,第 208 页。

⑤⑥胡自逢:《孔子解〈易〉十九则述要》,收入《易学识小》,文史哲出版社 2000 年版,第 417—437 页。

⑤⑦胡自逢:《周易象传探赜》,收入《易学识小》,第 349 页。

⑤⑨金景芳:《关于〈周易〉的作者问题》,收入《学易四种》,第 215—224 页。按:此文又刊《周易研究》1988 年第 1 期,第 1—7、19 页。

⑥①吕绍纲:《周易阐微》,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,第 277—293 页。

⑥②杨庆中:《周易经传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,第 172—189 页。

⑥③虽然多数学者都因出土文献而纷纷将《易传》著成的时代提早,但黄庆莹反而将时代延后。黄庆莹 1978 年所撰《周易纵横谈》一文,原认定:“《十翼》除杂卦为西汉作品外,都著成于春秋战国,代表着先秦儒者对周易的阐释。”(黄庆莹:《周易读本》,三民书局 2001 年版,第 3 页)但在《周易的名义内容大义和要籍》中则认为除《说卦》是先秦的作品,其他诸传皆应成于汉代。(第 15—18 页)

⑥④戴君仁谓:“《象》、《象》等《易传》之辞,多可见韵的通合现象。而与《荀子》书的押韵现象最相近,推测《易传》作者和荀子书作者时地均相近,而假定为在荀子稍前,南方的儒者。”(《谈易》,第 27—28 页)高亨则主张《象传》及《象传》的押韵现象,“与南方诗歌如《楚辞》中之屈宋赋及《老》《庄》书中之韵语之界畔相合”,推论《象》、《象》两传作者必是南方人,(《周易大传今注》,第 7 页)戴建璋则谓“《象》、《象》两传韵语通押的现象,与《诗经》及《易经》卦爻辞等多有不合,而接近于《荀子》、《老子》及《楚辞》中屈、宋两家作品”,赞同戴君仁、高亨之见。(《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》,第 10—11 页)

⑥⑤张岱年:《论〈易大传〉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》,《中国哲学》第 1 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1979

年版,第126—127页。

⑥7金德建:《〈中庸〉思想和〈易〉理的关系》,收入《先秦诸子杂考》,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,第171—174页。

⑥8郑吉雄:《从〈太一生水〉试论〈乾·象〉所记两种宇宙论》,《简帛》第2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,第139—150页。郑吉雄更详尽的研究则见氏著:《太一生水释读研究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14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,第145—166页。

⑥9以“阴阳”为例,《论》、《孟》中未见而散见于《老》、《庄》,故学者多将《易传》中之“阴阳”视为道家之说。但郑吉雄指出:阴阳二字,本即指日光隐显,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用“阴阳”为地理方位,但《易经》本质上与《诗》、《书》不同,不能据《诗》、《书》来推论《易经》中没有抽象义涵的“阴阳”观念。参郑吉雄:《试从诠释观点论易阴阳乾坤字义》,收入彭林主编:《中国经学》第6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又收入《周易玄义诠释》,第18—33页。

⑦0如《中庸》一篇,钱穆、朱伯崑认为是秦汉儒者所作,金德建、李学勤均认为应出于子思。参钱穆:《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》,收入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(二)》,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,第27—33页。朱伯崑:《易学哲学史》第1册,第47页。金、李二人之说参前文。

⑦1郭沫若:《〈周易〉之制作时代》,收入《青铜时代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,第66—69页。

⑦2郑吉雄:《从遗民到隐逸:道家思想溯源——兼论孔子的身分认同》,《东海中文学报》第22期(2010年7月),又收入郑吉雄、林永胜主编:《易诠释中的儒道互动》,第30—35页。

⑦3⑦4陈鼓应:《易传与道家思想·序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,第ii—iii页。

⑦5“易道主刚”为郑吉雄所提出,其意并非说易理有刚而无柔,而是说易理乾坤、刚柔、健顺、变常,都是前

者为“主”,后者为“从”,这是因为易理建立在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论上的缘故。而后世大儒如董仲舒、王弼、张载、朱熹等人解《易》,无不发明此义。参郑吉雄:《论易道主刚》,《台大中文学报》第26期(2007年6月),又收入郑吉雄主编:《周易经传文献新论》,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版,第189—215页。

⑦6陈鼓应:《先秦道家易学发微》,收入《道家易学建构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,第1页。

⑦7如吕绍纲于1989年撰《〈易传〉与〈老子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——兼与陈鼓应先生商榷》,1995年撰《论〈系辞传〉属儒不属道》,2001年撰《〈老子〉思想与〈周易〉古经》,均收入吕绍纲:《周易的哲学精神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。周桂钿:《道家新成员考辨——兼论〈易·系辞〉不是道家著作》,《周易研究》1993年第1期,第1—5、26页。廖名春:《论帛书〈系辞〉的学派性质》,《哲学研究》1993年第7期,第58—65页。郭沂:《〈易传〉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平议》,《齐鲁学刊》1998年第1期,第34—42页。陈启智:《论〈易传〉的学派属性——与陈鼓应先生商榷》,《周易研究》2002年第1期,第8—18页。颜国明:《“〈易传〉是道家〈易〉学”驳议》,《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》第21期(2002年9月),第171—215页;《从易学义涵检视“道家易学”谱系》,《鹅湖学志》第32期(2004年6月),第85—142页。张丰乾曾整理此一论题之发展及各家观点,参《〈周易〉究竟属于哪一派——〈周易〉学派归属问题研究综述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1997年第2期,第24—28页。

⑦8萧汉明:《关于〈易传〉的学派属性问题——兼评陈鼓应〈易传与道家思想〉》,《哲学研究》1995年第8期,第80页。

⑦9何泽恒:《孔子与易传问题复议》,收入《先秦儒道旧义新知录》,大安出版社2004年版,第39—117页。

(编校:章 敏)